

迷失的男性

——佩德罗·阿莫多瓦电影中的男人们

沈倩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ISBN 7-309-04835-9

迷失的男性

——佩德罗·阿莫多瓦电影中的男人们

沈倩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失的男性：佩德罗·阿莫多瓦电影中的男人们 /
沈倩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11
ISBN 978-7-308-21272-4

I. ①迷… II. ①沈… III. ①电影影片—男性—人物
形象—研究—西班牙—现代 IV. ①J909. 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069241号

迷失的男性——佩德罗·阿莫多瓦电影中的男人们
沈倩 著

责任编辑 蔡 帆
责任校对 吕倩岚
封面设计 周 灵 汪子鸣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彩 插 12
字 数 223千
版 印 次 2021年11月第1版 202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1272-4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FOREWORD 前言

本书以西班牙知名导演、编剧、制作人佩德罗·阿莫多瓦的二十一部长电影为分析范本，研究该导演电影文本中的男性形象。阿莫多瓦被众多电影专家研究，包括他的艺术风格、拍摄手法、人物设置等等。众多话题中，导演作品中的女人们被聚焦关注，电影专家们钟情于诠释“阿莫多瓦女性”们的银幕形象，视阿莫多瓦为“女性导演”。女人们被一次又一次地书写，她们的故事，她们的人生，她们的挣扎，她们的奋斗，“……通过激发观众的情感以及认同屏幕上的角色所遭受的人类戏剧性的渴望，阿尔莫多瓦能够使观众接受不同的边缘身份，甚至因为他的女性们而唤起人们的同情”。(Ehrlicher, 2005)¹“男人哭泣，但是女人哭泣地更好……如此，他认为女人们分享得更多，表达得更多，感觉得更多，创造得更多，而且，哭得亦更好。”(López, 2006)“简而言之，女人永远不会有足够的爱，事实是她们比男人遭受的痛苦更大……”(Méjean, 2007)“……蛇蝎美人的中心人物形象由一个男人所代表……是‘异性恋身份的幻象理想，是模仿产生的效果’的模仿。”(Bonatto, 2008)“阿莫多瓦的女人们很坚强，有斗志，自给自足，但她们遭受了很多痛苦，并且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都是孤独的，即使她们完全是自己孤独的主人。”(Soliño Pazo, 2011)“……她们实现了女性解放，并发现有可能不躲在男人身后而生活。”(Vázquez, 2012)“……尽管她们是命运的主人，她们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合理化，以热情而狂野的方式正常行事，使自己完全地投入各种生活中的感情……”(Pereira, 2013)“阿尔莫多瓦的人物两性界限是模糊的：爱可以是同性恋，也可以是异性恋。混合社会性性别，他互换使用它们，将它们平等对待，而不重复。”(Díaz, 2013)“阿尔莫多瓦电影中的女

1 本书中引用了大量西班牙语文献或文本，均由作者翻译。——作者注

性通常是紧迫和可能的社会变革的源泉……妇女产生了具有使整个社会更新潜力的创造力、想象力，因为妇女的‘极度不稳定’使她能够改变、更新和重塑自己。”（Chacón, 2012）当然，亦有学者的研究涉及阿莫多瓦电影中的男性，提出阿莫多瓦电影中的男性是“伊比利亚男性”（Orama-López, 2009）。“男性的形象受到质疑，他们是专制父权制的忠实代表，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不存在的，对出现的问题亦不理睬。其他一些男性具有纯粹的装饰、起填充或平衡的作用。”（Puerta, 2009）似乎阿莫多瓦只对女性世界的情感表达感兴趣，男性成为被遗忘的阴影。乔治·齐美尔认为女性是真正的人类，而男人是一半动物一半天使，而动物部分正是女性与男性关系的悲剧与痛苦的来源。男性与女性皆生活于同一片蓝天下。阿莫多瓦电影中的男性被忽视的现状实则是其价值所在：他们以缺失而存在；他们看似躲在阴影处，却是推波助澜的一分子；他们无法被女性所遮掩。

阿莫多瓦并没有遗忘他的男人们，他们拥有在导演创造的“阿莫多瓦世界”中的分量。那么他们到底是如何的呢？本书以西班牙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1 世纪电影史中的男性形象为参照，横向分析阿莫多瓦电影中的男性与西班牙其他导演作品中男性形象的异同，纵向分析阿莫多瓦作品中男性人物形象的发展演变。以阿莫多瓦的第一部长电影到最近投放市场的电影为研究样本，剖析每部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他们自身的人物形象、性格特征、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与女性之间的互动，都将被仔细分析和对比。不仅从导演每部电影的人物着手，同时也纵向分析阿莫多瓦男性形象、身份的发展脉络：他们是否具有传承性、是否有改变之处，等等。“西齐美尔认为：因为人际互动所形成的复杂的关系网络构成了社会”¹，为此，本书于人物的关系网中探究阿莫多瓦男性家庭模式

1 《西方性学名著提要》，李银河，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2 页。

的趋势，他们在以家为单位的社会联系中是如何被影响和影响他人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及形成身份的。以他们与女性、男性、家庭、社会等的关系为支撑——因为他们不仅是“男人”，更是“父亲”“孩子”“兄弟”“丈夫”等——换句话说，他们以特定的方式相关联，例如履行社会、家庭等责任，这种特征经常限制或反噬自我本身，形成男性的命运。同时，结合西班牙社会文化、艺术潮流等，宏观展示阿莫多瓦镜头下的“迷失的男性”。

阿莫多瓦于 20 世纪 70 年代即展现其卓越天赋，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对西班牙电影迈向国际具有不朽的贡献。不管从镜头语言、剧本设计，还是拍摄手法而言，阿莫多瓦都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蜚声西班牙和国际电影舞台。阿莫多瓦电影中展现的人物并不完全继承西班牙本土地方特色，他们是社会的另一面，但却更能展露时代于文化的影响。阿莫多瓦成长于西班牙社会变革时期，冷战的结束、佛朗哥独裁统治的衰退、新型社会模式的形成等大时代背景、动荡的社会让阿莫多瓦如同其他西班牙年轻人一样，极力寻找自我人生的意义和张扬自我的出口。社会变革中阿莫多瓦积攒下人生经验和叛逆之种，之后，在波普艺术、地下电影以及马德里文化运动的催化下，用自己独特的风格挑战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特别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用不羁的手法彰显他叛逆、极端、奇特的视角以及内心波涛汹涌的原始欲望。“艺术的现代体系不是一个实质或用途，而是我们自己所做的那些。艺术，总体而言，是一个几乎只有两百年历史的欧洲发明。早先的它曾有一个更实用的艺术体系，大概持续了有两千年。而当那个发明消失，可以肯定地说，它将会继续演化成艺术的第三个体系。”¹当然，电影作为这个被“发明”的体系之一员，是文化的放映机，各种文化的丰富性内容、信息等的呈现，

1 Shiner, Larry. (2004). *La invención del arte: una historia cultural*. Ediciones Paidós Ibérica, S. A. p.21.

方便不同个体、群体的交流，是一种让人们多方面的接触不同的文化的艺术性手段。

阿莫多瓦的电影充盈着欲望，爱的欲望、生存的欲望、性的欲望以及死的欲望……所有的欲望都是为了从各个角度诠释人性的深不可测、变幻无常。“……电影首先是社会的工具和实现者，如同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利用它来服务社会；电影是个艺术体，不光顾虑美的快感，来作为理解的手段和现实的分析，同时也从它的社会作用来范畴它。”¹ 导演早期作品中惯以夸张、戏谑手段嘲讽社会规范下的条条框框，惯以边缘人员的生活状态为话题，通过呈现社会禁忌给予观众视觉冲击和情感洗涤。随着年岁的消逝，阿莫多瓦的作品逐渐成熟，镜头叙述愈加柔和、风格愈加个人、观点愈加敏锐。探索至今，已建构出他的影像世界下的欲望、情感，和谐、混乱，叛逆、反思，等一系列艺术元素，他的故事在成熟阶段更以错综复杂的人物内心活动展现从放肆的享受生活到寻求生存意义的哲学。阿莫多瓦从其创作初始即奠定了他的作品基调，反对教条主义、反权力、崇尚放浪形骸地放飞自我；为此，导演所选择的剧本故事以及人物设计中都不可避免的需要非传统人物，利用各种浮夸的元素以作用于现实社会的巨大反差而引起人们的思考。或许是阿莫多瓦其个人生活经历的沉浮，他的作品更多假借喜剧形式讲述悲剧，掺杂眼泪与欢笑，以两者的结合浓墨悲剧，从而表现人生存于世的嘈杂和无奈。显而易见，导演以其作品自嘲，并嘲讽人生、欲望、人性，以包装精美的乐观态度讲述苦涩的人生。

1 Mora Catlett, Juan. (2006). *Reflexiones sobre la enseñanza de la realización de cine de ficción*. Enseñanza de la cinematografí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centro universitario de estudios cinematográficos.p35.

绪 论 / 001

第一章 西班牙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的阿莫多瓦影视艺术 / 017

第一节 西班牙 20 世纪后半期社会变革与文化革新于阿莫多瓦的影响 / 019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波普艺术于阿莫多瓦的影响 / 025

第二章 20 世纪 70 年代—21 世纪西班牙电影中的男性身份与形象 / 035

第一节 20 世纪 70 年代的男性身份与形象 / 040

第二节 20 世纪 80 年代的男性身份与形象 / 061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的男性身份与形象 / 069

第四节 21 世纪的男性身份与形象 / 077

第三章 阿莫多瓦 21 部电影中的男性身份与形象 / 085

第一节 阿莫多瓦作品的 40 年——走向成熟之路 / 087

第二节 阿莫多瓦男性的身份与形象——“迷失的男性” / 098

第四章 阿莫多瓦男性与西班牙电影中的男性身份与形象比较 / 205

第一节 被消失的“大男子主义型”男人 / 207

第二节 寄生虫“花花公子” / 212

第三节 憧憬童年的“伤痕者” / 216

总 结 / 219

参考文献 / 221

附 图 / 229

电影附录 / 231

阿莫多瓦的电影一贯秉承导演本人的独特风格，给予观众别样的感官享受。影片中的西班牙文化、人文气息、时代烙印等，通过艺术包装呈现，为导演获得极大的世界级口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莫多瓦对西班牙民族身份的解构已经成为一种重构，因为他的电影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人对当代西班牙的最易理解描述。”¹阿莫多瓦的作品改变了世界对西班牙的印象，导演让现实的西班牙内化为他的视角下的西班牙。

阿莫多瓦是西班牙“马德里文化运动”最杰出的导演之一，他的生活阅历、个性等皆被艺术化于自己的作品中，那里充斥着挣扎、奋斗、颓废的男男女女。导演吸收传统电影的表现手法、美学技术等，极大地丰富他的创作平台，独领西班牙语世界影视作品的风骚。中国谚语中的“时势造英雄”，用在阿莫多瓦身上最是恰当不过，西班牙社会转型期的动乱可以说造就了艺术家阿莫多瓦的诞生。“的确，西班牙依旧受佛朗哥政权的巨大影响……标记了整一代人，包括他们的自由、性革命和电影。在阿莫多瓦的电影中，这个社会还在不断地存在并震动着。”²阿莫多瓦利用社会、文化滋养他的作品，联系现实又超脱于现实。

阿莫多瓦的作品塑造出一个强大的母系社会：女性始终赋有大母神的形象，她们强大而具有吞噬力。男性作为被吞噬的对象，无法抵抗子宫的力量。“远离西班牙神话中大男子主义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反叛过去，不论好坏，阿莫多瓦将强壮的女性摆在舞台中央，残酷地摧毁弱小的男性角色。”³阿莫多瓦作品中的“英雄”是女性，而非男性，她们面对生

1 Allinson, Mark. (2006). *A Spanish Labyrinth: The films of Pedro Almodóvar*. I. B. Tauris & Co. Ltd. p.5.

2 Méjean, Jean-Max. (2007). *Pedro Almodóvar*. Ediciones Robinbook, S. L. p.15.

3 Allinson, Mark. (2006). *A Spanish Labyrinth: The films of Pedro Almodóvar*. I. B. Tauris & Co. Ltd. p.5.

活顽强地挣扎和抗争，在混乱的情感世界中奋斗自己的一席之地，从象征意义上或实体意义上而言，女性是真正的力量单位。而阿莫多瓦的男性们，却生存在满是限制他们欲望和存在感的强壮女性的世界中，自怨自艾，甘愿缴械，失去斗志。“觉醒是角色经历的某种屈服，是进入未知世界的重生。觉醒，对男人来说，是放弃权力和控制，对女人来说，则是获得权力。”¹阿莫多瓦的女人为了获得权力而努力生活，因此，他的影片是女性奋斗史。每个男人都是男性社会的体现，他们承载着世界的负担，是被选中的牺牲品。“但一个男人不会不做男人。因此他是不由自主地有罪，并受到他本人没有犯下的过错的压抑。”²阿莫多瓦的男性们消极地放弃权力，依赖女性的救赎而不是回归自我内心，无法从自身获得能量。男性是被“欲望法则”操控的“激情的迷宫”。他们没有唯一的挑战，只有通过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冒险中的自我身份的认同，生活在连续不断的矛盾中。

阿莫多瓦的男人们可以是儿子、父亲、祖父、丈夫、同性恋者、变性人、异装癖者等，他们被导演钳制在他的“阿莫多瓦命运”中。此命运没有被解救的可能性，因为悲剧是男人们的最终结局，也是他们生存在生活中的方式。从电影的整体设计中，我们表面上感受到导演对女性的终极关怀，然而，如果我们更深切地去体会，将能意识到阿莫多瓦对男性被注定的命运有着深切的同情。男性和女性可以互相责怪，但是他们双方都拥有过错，因为两者本不该同时存在。

每一个生命都有它自己的轨迹，因为每个生命都有它的一个命运。这不是迷信的表达，命运由家庭社会环境、个体性格以及生活体验所建构。总体而言，这些条件是同时出现并作用于人本身的塑造，并决定他未来一切的人生方向。为此，在分析阿莫多瓦男性时，社会、家庭、个人等元素的相互影响是不可缺失的。他们在阿莫多瓦创造的电影环境中生存、煎熬、折磨和抗争，然而却失败并迷失在其中，永远徘徊于命运的轮回中。阿莫多瓦的男人们被世界孤立，他们被男人、女人、父母亲、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们所围剿。导演影片中的男性被给予了关注，他们是饱满的、有张力的。男人们用极端、夸张的方式释放人类原始的感情、欲望，从而表现人类自然性与文明、伦理道德间的冲击。阿莫多瓦电影中的男性是牺牲品，他们是男权系统、强大女性支配下的傀儡。他们生存在制造他们的家庭

1 《经典人物原型 45 种——创造独特角色的神话模型》，维多利亚·林恩·施密特（著），吴振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2 页。

2 《第二性 II》，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91 页。

环境下，无缚鸡之力，甘愿被命运吞噬，终生深陷在致命的循环中，而没有出路。

人的一生皆在驱逐死亡的恐惧。无论是碌碌无为还是建功立业，终免不了死神的召唤。面对时间的绵延无终和生命的瞬息短暂，人想尽一切手段遗忘短命的悲哀。“Martin Heidegger 不止一次地说过，是死亡造就了人性。我们必死的事实，与我们的反叛以及我们创造的文明密切相关。”¹ 我们所做的一切皆是徒劳，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亦是意义非凡。卡尔·罗杰斯曾说人一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你自己，那么，你是谁呢？成为你自己的这个标准又是谁为你制定的呢？所谓的你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制定你所想要制定的标准呢？人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过程是逐步增加身份、成为他者的过程。我们不再拥有主体的权力，我们被掌控。社会、文化、传统、规则等玩着它们的游戏，我们深陷其中，被动地成为被异化的符号。我们愈是焦急地想得到主体身份，愈是被自身吞噬。“由子宫内到子宫外的生活诚然是一次重大的变化；但是，在许多方面，生下来的婴儿与未出生的婴儿没有什么区别，他感觉不到外界事物，不能养活自己，完全依赖母亲，如果没有母亲的帮助，他就会死亡。实际上，诞生的过程仍然在继续……个人的整个一生不是别的而是诞下自己的过程。的确，我们在死亡之时应达到最完全的生——虽然大多数人的悲惨命运是在诞下自己之前便死了。”² 人们真的能够诞下自己？文化、民族、地域、家庭等等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等大背景塑造了我们。如果去除以上元素，我们是什么？可能，我们将回到动物性——哺乳动物（文字给出的定义亦是社会性的展示）。“语言是一种社会合同：所有通过语言表达和接受的事情已经装在了说话者所有文化的概念模式中固有的意义。”³ 语言，让人类远离自然，被符号化，身份从呼唤中逐步形成，人开始异化，逃避自由并具有成为物的意图。

“随着科学认识的增长，我们的世界渐渐失去了人性。人类感觉自己在宇宙中孤立无援，因为他脱离了自然界，失去了与自然现象间情感上的‘无意识同一性’（unconscious identity）。”⁴ 我们处于矛盾中，既想亲近自然，亦努力改造它。然而，

1 《权力与无知——寻求暴力的根源》，罗洛·梅（著），郭本禹、方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99 页。

2 《健全的社会》，艾里希·弗洛姆（著），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9 页。

3 《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琳达·哈琴（著），李杨、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4 页。

4 《荣格文集 I·分析心理学》，C.G. 荣格（著），申荷永（总策划），高岚（主编），长春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73 页。

追求理性的目的需要超越、战胜自然。我们的确在远离自然，因为我们恐惧无意义的存在。自然代表着原始、纯粹、天真等等，它亦是死亡的代表——是原始的召唤、回归的呐喊。人们向往永生，“对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或一个人来说，文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通过连贯的审美观点、对本我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来维持一种特性，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家园和我们自己所崇拜的物品中展示这些观念，以及他表达这些观点的品味。因此，文化是一个敏感、情感和道德的领域，也是一个智慧的领域，其目的是使这些情感具有秩序”。¹它是意识永生的具象体现，它成为一种记忆，以历史的方式流淌在每一代出生的人类血液中。弗洛伊德认为文化压制人的社会生存、生物生存，是人类神经官能症的产物，是压抑自然性的结果。我们的不安以征服自然得到舒缓，亦付出代价——自我被掩盖。“文化和自然的二元关系助长了一种等级关系，在其中文化任意地把意义‘强加’于自然之上，使得自然成为一个‘他者’，而对它极尽掠夺挥霍之能事，并且也在一个统治的模式上维护了能指的理想形式与意指的结构。”²文化的后天性、人造性无法甘心屈尊于自然的现状，它的自卑需要超越来补偿。爱德华·霍尔提出人类的文化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后天学会的，同时它是共享的，然后却不由自主地划分出不同群体。文化压迫自然，去除它的主体性，否定它的存在意义，这也正给予人的身份等级制的创建提供借口。荀子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³荀子的理想主义积极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德的正向作用，抬高人的地位。自然被人凌驾于上，人不再向自然低头，而是努力改造它来适应文化的需要。随着人类的繁衍，文化被复制，我们的种族身份是与后者紧密联系，互生互存。

人永远不可能自由，我们始终是“奴隶”。生存的欲望以生物学的角度而言，我们被基因控制。“……复制基因，而我们则是它们的生存机器。我们完成我们的职责后就被弃于一旁，但基因却是地质时代的居民——基因是永存的。”⁴我们企图超脱自然局限我们的条件，但却陷入“正是生存的需要以及性爱所衍生出的家庭感，促使每个个体做出了牺牲。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牺牲具有进步意义，

1 Bell, Daniel. (1989). *Las contradicciones culturales del capitalismo*. Alianza Editorial, S. A. p.47.

2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页。

3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0页。

4 《自私的基因》，理查德·道金斯（著），卢允中、张岱云、陈复加、罗小舟（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

也得到了宗教的认可：人们放弃些许欲念，作为供奉给神明的献祭，由此得到的公共财富就是‘神圣的’。那些一意孤行、不愿就范的人，就是社会的‘罪人’和‘叛徒’，除非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杰出本领足以将他们包装成‘伟人’和‘英雄’”。¹ 我们无法逃避生而为人的悲哀。对权力的追求让人暂时忘却自我的蝼蚁性，身份本身内含权力感，对它的追求被合理化，成为时尚。生命本身被演绎化抽象得虚无目的。

人们害怕“特殊”“特别”“不一样”等此类词汇，因为这将会导致孤独、离群寡居等后果。人类是群居动物，身份是群体性活动中所给予和产生的。人们害怕被排挤，成为过街老鼠的滋味只有当事人才知晓，这是对人存在意义的质疑。成为过街老鼠至少还被他人目及所指，更可怕的是自己的存在被彻底忽视、被虚化，存在成为不存在的事实。“这种对于接受的渴望的确是被疏离的人所特有的感情。为什么被大家接受会令人感激不尽呢？除非他怀疑自己能否被人所接受……身份感的唯一庇护所是一致性。能被接受确实意味着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自卑感来源于感到与他人不同，至于这不同是好还是坏，无人关注。”² 人努力地活着，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疯狂地搜索各种身份去充实失去主体性的自我，努力装扮自己，只为获得安全感、价值、意义等抽象的概念。人们需要优越感，就像不需要自卑感一样，它是被文化灌输的后果。人不自觉地活在他人的阴影下，以至于为了获得他人的眷顾，而忘记自己也曾拥有一片阴影。当人们将关注力永远投射向他人时，自我亦成为客体。“人退到了接受性的、交易性的方向上，不再具有建设性；人丧失了他的自我感，变得依赖他人的认可，因而倾向于求同一致，却又感到不安全；人感到不满足、厌倦、焦虑，并且用他的大部分精力尝试补偿或掩盖这种焦虑感。他的智力卓越，他的理性却堕落了，就他的技术力量而论，他正严重地威胁着文明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³

我们被他人影响，他人包括文化、地域、民族、家庭等因素，而他人亦被我们影响。在互相的影响过程中，我们形成生存下去的秘诀——“伪装”。它如同一层壳，包裹住我们，我们无意识地适应它对我们的塑造。荣格称它为人格面具，“人格面具的存在并非意味着有意地欺骗，它的存在只是因为如下事实：存在一种

1 《性学三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徐胤（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页。

2 《健全的社会》，艾里希·弗洛姆（著），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3 《健全的社会》，艾里希·弗洛姆（著），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

关系系统，因为这一关系系统，我从来没能脱离客体对我的影响。只要你生活这个世界上，你就不可能逃避形成一种人格面具的命运。”¹ 它即是身份。我们不可以茫然地确定是我们自己主观性地选择人格面具或身份，因此人的内在性与外界接触的过程是此消彼长，同时作用的能动过程。我们可以说是主动地被迫性地接受自我的身份，如同是玄虚的命运，从一出生即被规划。戈夫曼亦认同人的表演，“后台区域或后台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场所，与给定的表演相关联，在这里的表演所促成的印象，故意要制造出与前台表演相反的效果。……前台表演所传达的各种弦外之音就是在这里精心设计出来的；在这里，表演者可以公开制造各种假象和他需要的印象……”² 后台、前台的服装等皆是人的面具，身份被无数次扮演。然而戈夫曼强调的是前台的虚假性和后台的真实性，而荣格却否认后台的存在性，人无时无刻地在扮演角色，这是不知不觉中对文化、社会、环境等产生的反应。而巴特勒认为“所谓的‘面具说’却假设了某个可以戴面具的主体的存在。性别不是面具，可以随戴随摘，更不存在一个先于表演的主体，仿佛‘面具’下真有某个‘演员’（主体）”。³ 巴特勒从人的本质探讨人的属性，她否定人有能力随意扮演，这是文化的强制规定，台前及台后是一致的。人在文化背景下表演出自我，是符合社会规范的强制原则。表演的过程即是主体形成的过程，性别是内在性，不先于主体存在。

霍尔巴赫认为自然是一台伟大的机器，其中事物构成无穷无尽的因果链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绝对的和有序的；同样，人类社会亦像自然界。一个人只能通过基本的服从并依赖于社会形象来拥有自主权。人类的性别是最大的身份，我们从一出生即被言语标记肉身——男或女。话语具有政治性，它创造和维持社会范畴和身份认同，话语是可以被替换、被改变的。社会建构论认为我们被社会构建我们的性别，生理性别即是社会性别，语言作用于肉体的功能是符号化它们。然而性别身份是流动的，它的社会性将随社会的干预而改变，它是被动的。“‘性别’是不可能从各种政治、文化的交会力分离出来的，它是在这些交会里被生产并得到维系的。”⁴ 尽管性别通常被认为是自然的，但事实上，它是

1 《荣格文集 I·分析心理学》，C.G. 荣格（著），申荷永（总策划），高岚（主编），长春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4 页。

2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欧文·戈夫曼（著），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7 页。

3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5 页。

4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4 页。

根据社会统治的政治目的在文化上加以阐述的。潜移默化的身份改变自我，人们被束缚、被限定、被改造，我们亦同时对所处的环境产生影响。我们被社会规范，被迫性地重复表演，由此创造主体。人类的自然性面对社会文明是永远甘拜下风，人们习得性无助地与婚姻共存，自我沉沦在无尽的无奈中。我们的文化可以塑造身体。

人们的“肉体”身份被二元化为男一女，语言的使用者成为权力的施展者，“肉体”被强制性规定，规范随着历史加固说服力。语言在被使用的过程中被文化赋予属性，身份的符号性亦被文化属性化。“男性‘主体’是一个虚构，是由禁止乱伦、并且强行以一种异性恋化的情欲对它进行无限的移置的律法所生产的。女性从来不是一个主体的标记；女性不能成为一个性别的‘属性’。”¹语言的使用者最终确定是男性，权力的无限延伸以言语确定抽象意义上的男性定义。然而男性是被建构的，它本身是为满足文化对自身规律的完善所设定的制度。男性被文化利用，它成为去除女性主体的借口。异性恋霸权欲确定自己的主导性，排斥其他不以繁殖为目标的人际关系。异性恋是被赋予的。繁殖是自然属性，它无法让文化为其定义，是原始性的演绎。异性恋是被文化概念化的称呼，它超脱于自然，人为地伪造使命感。异性恋被视为标准规范，其他的性行为被视为对异性恋的背离的一种倾向。然而，不管是同性恋、异性恋还是其他恋，它们皆应是平等的，看似异性恋霸权文化赐予异性恋神圣的地位，然而它们皆是复制品。“同性恋之于异性恋，并非复制品对真品，而是复制品对复制品的关系。”²性别中任何一个从来都没有特权，我们的身份基于社会赋予我们的权利。性别就像一种准则，只是隐约地反映在某些社会成员的行为中。福柯认识到，性别不是自然特征或人类生活的既定事实，而是具有一种历史、文化和社会根源而不是生物学根源的可见的构建经验。同样，巴特勒认为性别是虚构范畴，身体自然不会保持性别，相反，它是通过在文化过程中使用性和建立某些权利关系来定义的。“性不是无法控制的本能，而是在进入文化、语言和意义领域的过程中被建构的一种力量。”³也就是说，我们以某种方式行事不是因为我们的性别认同；相反，我们通过行为方式得到身份认可。我们所谓的身份政策是由权力产生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构成它

1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8页。

2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4页。

3 《西方性学名著提要》，李银河，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的身体的命运和权利。我们的行为模式维系性别规范的建构。“‘女人’不必一定是对女性身体的文化建构，而‘男人’也不必一定是诠释男性身体的。”¹ 女人—男人的称呼性随文化而流动，它们是不固定的。也就是说，文化以文字的方式构建自然的肉体是人工的，是非主体的无效行为。女人与女性身体，男人与男性身体，两两并不互相承诺对应，是使用的过程凸显它们的联系，却无法命定必然关系。“对维蒂格来说，加之于性别的二元限制是为了强制异性恋体系的生殖目的服务的。”² 性别的二元化是一场阴谋。人们被强行机械式地归类，否定各种可能，只为保障繁殖的利益。这难道不是文化向自然妥协的条件？文化恐惧非繁殖的身份属性是恐惧自然对它的惩罚——文化的消失。

“维蒂格认为‘性别’是由一个压迫女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意指体系通过话语生产并传播的。”³ “性别”首先压迫性别主体，也就是说，阳具逻各斯主义的直接压迫对象为“男性”。性别体系由话语生产并指向压迫男性，男人在游戏规则的创建者中亦是游戏者，他们以自我压抑而赢取特权，同时以压迫女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作为补偿。换言之，在被创建的权力体系中，每个人都是牺牲品，而位于权力中心的他们，将成为自我变异最彻底的主体。上野千鹤子认为男权世界是由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厌女症以及同性恋憎恶三者共同构成性别秩序。“……男人之间的纽带，是一种‘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为了维持男人集团的主体性和优越性，需要将女人‘他者化’，视为欲望客体，加以蔑视……为了保证男人集团中每位成员的主体地位，还要严厉清除同性恋。因为同性恋者把同性男人视为欲望对象，会使男人沦为欲望客体，扰乱男人集团的秩序，十分危险。”⁴ 也就是说，男性维护自身特权必须以团体的形式，保障权力的同时强化排斥非团体成员，以划清界限，实现权力最大化。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以团体的方式如何解释内部集团等级制度下低等男性的权力以及如何划分成员等级属性？换言之，男性团体内部无法实现的平等一如厌女症及同性恋憎恶，男性成为组织的牺牲品。

女性不管选择脱离子宫还是返回子宫，她们自身是拥有子宫的主体。子宫的力量赋予女性自然的力量，她们与生俱来比男性更多地自我保护和自我肯定。“我

1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6页。

2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6页。

3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8页。

4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59页。

们从来都摆脱不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一种是，脱离子宫，脱离动物的生存形式，摆脱自由的枷锁，进入更具人性的存在；另外一种倾向是，返回子宫，回到自然，回到肯定和安全的“地方”。¹然而男性在面对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时，他们有时是第一种倾向的雄性代表：他们是权力、力量、地位和金钱，他们是男性社会的英雄、胜利者，他们因与子宫对抗而获得满足；男性建立自己的安全帝国，抵制子宫对他们的吞噬；他们用制度条约规范对抗自然的混沌杂乱，他们拒绝回到子宫，拒绝回到“母亲”的主宰。“……使一个人克服重生的危险并脱离母亲的掌控最有效的是有规律的工作（regular work）。”²这是从自然性向社会性转化的过程。不管从事的是什么性质的工作，从群体中所获得的社会属性剥离原生家庭的禁锢，以获得一种身份的过程消解另一种身份的唯一性。然而，当摆脱母亲的掌控后随即陷入文化、社会的摆布，人社会化的过程的确因身份的多元化使人更富有张力和维度，人生融合的饱满使得生命更有弹性。人却因此越来越远离自我，被同化、被打磨，最终成为符号和复制品。男性有时是懦弱、无能、无法自我协调的第二种倾向的雄性代表：他们仰赖母亲、女性、子宫，他们躲入“母亲”的子宫获得平静，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女性。女人擅于驾驭眼泪——被荣格称为“水性的力量”，母亲更是懂得借助泪水或抱怨使唤儿子，这是破坏人际关系中的合作，借势将他人贬低至被操控地位的手段。然而男性却屡屡中招，还心甘情愿。所有男性“在幻想中，死便是回到子宫，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³，因为子宫是人类的第一个住所，它让人感到安全和舒适，它依旧被渴望着。

“人类学学者玛里琳·斯特拉森和卡罗尔·麦克尔迈科指出，自然/文化话语惯常把自然比喻为女性，需要文化的征服，而文化总是被比喻为男性的、主动的和抽象的。”⁴自然是原始的、承载的、固定的，它遗世而独立，是永恒的；而文化是后天的、创造的、流动的，它瞬息万变，是短暂的。自然无法被文化征服，人类所做的是伪征服。自然冷眼旁观文化的矫揉造作，是因为前者能在瞬息间摧毁文化价值。女性同样如此，她们不会被男性征服，女性强大的子宫是生一死的归宿，是自然赋予她的最强大的力量。女性被文化压迫那是她们还没有觉醒，她们

1 《健全的社会》，艾里希·弗洛姆（著），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2 《荣格文集I·分析心理学》，C.G.荣格（著），申荷永（总策划），高岚（主编），长春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3 《健全的社会》，艾里希·弗洛姆（著），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4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页。